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亲历者记忆

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朱地

在中央苏区……关于陕北的错误肃反……延安整风时期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清算……追记半个世纪前的一次长途旅行……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……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……拍案一怒，各走各路：我与蒋经国的决裂……见证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曙光——答《中国人大》《百年潮》记者问……《学习》杂志错误事件……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……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……关于《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》一文的补正……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——张劲夫访谈录……春风秋雨二十年——杜润生访谈录……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——于光远、李佩珊、龚育之访谈录……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……忆一九五八年军队反“教条主义”斗争……徐水“大跃进”亲历记……信阳事件：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……一九六一年随彭德怀回乡作调查……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“幸运”调查……包产到户：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……跟随田家英调查“包产到户”……上书毛泽东，保荐责任制……八届十中全会后的陶铸——一个秘书的回忆……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——我的所见所闻……《二月提纲》和东湖之行

QINLIZHE JIYI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)

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亲历者记忆

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朱 地

QINLIZHE JIYI

(上)

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历者记忆/杨天石主编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5. 12

(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)

ISBN 7-5326-1943-5

I. 亲... II. 杨... III. 中国—现代史—历史事件 IV. K27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6140 号

监 制: 张晓敏

统 筹: 唐克敏

责任编辑: 薄铁炼

装帧设计: 姜 明 明 婕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亲历者记忆

(全二册)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www.ewen.cc www.cihai.com.cn

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41.25 插页 4 字数 555 000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 000

ISBN 7-5326-1943-5/K·320

定价: 59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512—86169958

题词者简介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薄一波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|
| 宋任穷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|
| 程思远 |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|
| 胡 绳 |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|
| 萧 克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|
| 张劲夫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|
| 袁宝华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|
| 任仲夷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|
| 季羨林 | 北京大学教授 |
| 张光年 |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|
| 刘大年 |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|
| 金冲及 |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|
| 蔡美彪 |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|
| 章开沅 |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|
| 张玉法 | 台湾中研院院士 |
| 巴斯蒂 | 法国全国科学院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|
| 狭间直树 | 日本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|
| 麦金农 |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|

《〈百年潮〉精品系列》序

龚育之

《百年潮》出精品系列，编者邀我作序，说：“你与《百年潮》有三重关系：既是读者，又是作者，还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。所以，这篇序，你非写不可。”我答：“说‘读者’，我的确每期都读；说‘作者’，我有时偶尔也作。只是‘主办单位负责人’一说，不能认同。我虽是中共党史学会这一届的‘负责人’，对主办《百年潮》却没有‘负’起‘责’来。何况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，我这个会长也不再当了。”不过，作为经常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，写序之请也不可辞。

写点什么呢？就写写创办和支撑这个刊物尽心尽力最大的三个人，不妨称之为《百年潮》创业的“三君子”吧。

第一位“君子”是胡绳。办这个刊物，他是创意者。他是我的老领导。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，他任中宣部科学处长时，我就曾在他手下任干事；四十年后，他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，我又是他的副手，任常务副主任兼常务副会长。胡绳久患癌症并多处转移，终于没能活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道门槛。送别胡绳归来，我写过几则琐忆，在《百年潮》上连载，记述几十年中我对胡绳的印象和同胡绳的交往。此文已经选入这部精品系列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单说《百年潮》的创办。

胡绳认为，党史研究成果主要在党史界内阅读、流转，这种“体内循环”的情况应当改变。走出专业人员的阅读圈子，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寻求读者，应当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。所以，除了办好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以外，他还希望办一个通俗的、可读性强的讲党史、革命史、近现代史的刊物。

胡绳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在中国的先驱。三十年代他和艾思奇等同志，就写了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哲学读物。四十年代他写的《二千年间》和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》，既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又具有很强的通俗性，是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史学读物。现在，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，又建议办中国近百余年历史的通俗刊物，这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宽阔眼界、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眼界。我们在党史室和党史学会工作的同志都很赞成这个建议。于是，就有了《百年潮》。

说“于是就有了……”，说得轻松，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。把一个好的创意付之实践，组织班子、约集稿件、编成刊物，并且坚持下来，是一件艰难而辛苦的事情。担负起创办《百年潮》重任的，是郑惠。这是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二个人——第二位“君子”。

郑惠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相识相交的老同学、老同事。一九九四年他从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，用习惯的说法是到了“二线”。他熟悉党史，又熟悉编辑工作。曾经参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，参与主持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上卷的编写，参与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的编写，参与主持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》的编写和《胡乔木文集》、《胡乔木谈中共党史》的编辑。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，到了党史室，又先后主编过《党史通讯》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。退到二线，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“余热”。创办《百年潮》的建议一出，郑惠自告奋勇，承担重任，大家也都认为他是适当人选，赞成和支持他当这个新办刊物的社长。说是支持，基本上限于精神层面。从筹备到出刊，自筹资金（没有财政拨款），自配人员（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），自办发行（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），郑惠实实在在是操尽了心，费尽了力。最难的还是组织稿件。刊物要办出品位、办出水准，关键是稿件的质量。郑惠交游广，信息灵，思路宽阔，眼光敏锐，不但提出选题，介绍关系，布置编辑四处组稿，而且亲自登门约稿，笑嘻嘻地同你谈，跟你磨，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，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。《百年潮》一出世，就显得很有生气，很有看头，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。

一九九九年党史学会换届，郑惠年逾七十，不再任副会长也不再任《百年潮》社长了，还是很关心《百年潮》的工作，并已开始《胡绳传》写作的准备。没有想到，二〇〇三年春天，郑惠在完成《程门立雪忆胡绳》一书之后，也因癌症逝世。我在《百年潮》上写了一篇文章：《故人长忆亦长磋》，记述从高中同学以来，五十八年中我和他的友谊，也已收入这部精品系列了。其中说道：“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，所做的最有影响、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，就是创办《百年潮》。郑惠为这个刊物，真可谓呕心沥血，在学界赢得了声誉。而誉之所在，毁必随

之。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《毛泽东与傅鹰》、《几番风雨忆周扬》、《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》……都送给《百年潮》发表,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,也就止于此了。”这是我对郑惠的记念,也是我对郑惠的歉意。

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三个人——第三位“君子”,是杨天石。郑惠为创办《百年潮》,罗致人才,请到了杨天石。郑为社长,杨为主编,好一对搭档。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专家,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。他所写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一篇学术论文,得到乔木很高的赞扬,这我是听说了的。但一直无缘谋面。他出任《百年潮》主编的时候,我和他还不相识。第一次同他见面,已是郑惠不再当社长以后,请杨天石继续当主编的一次会议上。这之后才有了交往,也并不密切,所谓“淡如水”吧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国文学,长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。他送给我他的著作:《海外访史录》、《横生斜长集》、《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》、《从帝制走向共和——辛亥前后史事发微》。关于蒋氏的一书,从海外到海内曾经激起一阵波澜。杨为批驳海外奇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《百年潮》未能刊出,在《博览群书》和《炎黄春秋》上发表了。听说,有关方面对此书有了客观而平实的评价,才没有酿成什么事件。办《百年潮》对他来说属于兼职,他兼而尽职,兼而敬业,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,对杂志倾注了很多心血。人事有更替,事业多磨砺,杨始终如一,坚守岗位,杂志办到今天,杨是功不可没的。

胡绳、郑惠、杨天石三“君子”,还有其他先后参与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,成就了一番《百年潮》的事业。

《百年潮》创刊,提出了八个字:“信史,实学,新知,美文”,我很欣赏。史要信,要真,要言之有据,不可信口雌黄;学要实,要下功夫,要言之有物,不可浮泛虚玄;知要新,无论在史料方面,或是在观点方面,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,不可把众所周知当鲜为人知;文要美,倒不是辞藻要如何华丽,而是谋篇布局、遣词造句都要考究,不可马虎潦草。《百年潮》赢得声誉,恐怕就在这“信史,实学,新知,美文”八个字的追求上吧。至于对一个刊物有称赞,有批评,本不足奇。学术是在争鸣中发展的。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最初提出百家争鸣,针对的就是中

国历史分期方面的不同学术见解。争鸣应该本着善意的态度,相互切磋,平等交流,而不是武断地乱扣帽子。争鸣应该开诚布公,而不是暗箭伤人。当然,作为一家刊物,不应讳疾忌医,而应从善如流,改进工作,提高质量,办得为读者更加喜欢,更加满意。

《百年潮》取名“百年”,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从反鸦片战争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,现代历史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则是八十多年,当代历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也已五十多年,这个历史过程还在延续。在中国的历史上,这一百六十多年是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,也是最值得梳理、总结和反思的。历史经验有正面的,也有负面的,都应该总结和反思,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。学习和总结历史,以观察和规划当前,古有明训。从我们党的历史来说,每一个重大的新局面,不都是从清理历史问题着手而开启的吗?新民主主义理论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,不都是在对历史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吗?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,不都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出来的吗?

《百年潮》从一九九七年开办,筚路蓝缕,十分不易。党史国史不易把握,这是编辑业务的困难;报刊市场竞争激烈,这是发行销售的困难;人员经费捉襟见肘,这是经营管理的困难。《百年潮》的同志们在困难中坚持,到现在已近九年。精品系列九卷十二本,选取的就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一部分作品。所谓“精品”,当然是在编者看来的属于或近于“信、实、新、美”之作。其实并不见得都是如此,读者见仁见智,会有自己的判断。这也是可以争鸣的。不过,无论如何,把从创刊以来的文章,挑选、整理、编辑成九卷精品系列,编者是花费了工夫的。可以说是《百年潮》创业的一道轨迹、一个印痕。这是不是也算对《百年潮》自己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呢?

二〇〇五年七月

目 录

《〈百年潮〉精品系列》序	龚育之	1
在中央苏区	杨尚昆	1
关于陕北的错误肃反	郭洪涛	19
延安整风时期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清算	杨尚昆	30
追记半个世纪前的一次长途旅行	胡 绳	36
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	杜润生	48
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	郭 建	61
拍案一怒,各走各路:我与蒋经国的决裂	贾亦斌	70
见证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曙光——答《中国人大》《百年潮》记者问	薄一波	82
《学习》杂志错误事件	于光远	89
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	黄青禾	95
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	王 康	110
关于《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》一文的补正	王 康	123
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——张劲夫访谈录	刘振坤	125
春风秋雨二十年——杜润生访谈录	刘振坤	136
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——于光远、李佩珊、龚育之访谈录	李真真	155

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	韦君宜	177
忆一九五八年军队反“教条主义”斗争	萧 克	192
徐水“大跃进”亲历记	刘 炼	201
信阳事件：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	张树藩	211
一九六一年随彭德怀回乡作调查	金 石	221
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“幸运”调查	李 庄	230
包产到户：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	杜润生	236
跟随田家英调查“包产到户”	丁伟志	244
上书毛泽东，保荐责任田	钱让能	257
八届十中全会后的陶铸——一个秘书的回忆	马恩成	267
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——我的所见所闻	龚育之	273
《二月提纲》和东湖之行	龚育之	287
编者附记	郑 惠	312

在中央苏区

杨尚昆

我是1933年1月底春节期间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的。当时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。到1934年10月,我随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,先后一年又八个月时间。

在瑞金,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,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,这是联络的“介绍信”。接着见到了刘少奇同志,他在中央苏区仍做工会工作,住在瑞金城。我被分配到临时中央宣传部。临时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,办公和宿舍都在一个大祠堂里。祠堂前临池塘,水清见底,塘边种着垂柳。村子不大,松林掩映下住着二三十户人家,环境十分幽静。张闻天、罗迈(李维汉)和吴亮平等同志都住在这里。我到时,闻天同志正在作报告。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同志本来住在叶坪,宁都会议后,毛主席请病假在福建养病,朱、周和王稼祥在反“围剿”前线指挥作战,中央局只有弼时、项英、邓发和顾作霖等同志在。不久,博古、陈云也到了。李伯钊进苏区后,先在闽西苏区做宣传工作,1931年10月调到瑞金。我们的小家庭又团聚了。

初识毛泽东与反“罗明路线”

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是张闻天,我给他当助手。

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是办好党的一刊一报。苏区的宣传工作那时还在初创时期,张闻天同志是有建树的。《斗争》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创办的机关刊物。进入苏区后不久,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,中央局原来出版的《实话》与《党的建设》两刊合并改名《斗争》,在1933年2月4日出版,由张闻天任主编。为了区别于上海版,刊次从第一期开始。前六期《斗争》中,我共撰写署名文章七篇,除第五期外,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。《红色中华》是一张四开的周报,创刊于1931年12月,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,主编是王观澜;1933年2月4日起,改成三日报,成为党、团、政府和工会合办的机关报,主编先是王观澜,以后是当过张闻天

秘书的谢然之(这个人后来叛变了)。从《红色中华》改版之日起到3月20日的一个半月内,我用“昆”的笔名撰写社论六篇,那时撰写社论的还有博古、洛甫、谢然之、李一氓、潘汉年和沙可夫、吴亮平等,这一刊一报是临时中央指导工作的重要工具。我初到苏区,对农村的情况不熟悉,对游击战争更没有实际经验,撰写的社论和文章只能记录和表述临时中央的基本意图。在中宣部的四个多月内共发文十三篇,可以算是“多产”了。



1933年夏,杨尚昆同少共中央球队合影(右一为杨尚昆)

主持苏维埃临时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主席,尽最大可能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方。他和项英一起先后发出向群众借粮供给红军、调剂民食接济军粮,以及动员群众为干部家属代耕等命令和指示,保障了战争需要又不违农时。4月下旬,苏维埃政府又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,我为此走访了毛主席。

毛主席问我:你是什么地方人?我回答:四川。他又问:你们四川有一位杨闇公你知道吗?我说:他是我的四哥!他便深情地询问烈士遗属的情况。我说有一子一女,四哥遇难时,大女儿一岁半,儿子才40天。现在由我四嫂抚养着。这一来,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贴近了。我说,《红色中华》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,这篇文章应该怎样写才好?他便侃侃而谈,告诉我应该怎么写,怎么写。那时,因为战争勤务工作繁重,中央政府下令:苏区18岁到40岁的青壮年“全体自动要以革命的办法,把在乡村的劳动力和辅助劳力尽可能地发动起来,投入夏耕”。文章强调要依靠党支部和贫农团,组织耕田队,帮助有困难的农户和乡村,对红军的公田还应组织特别耕田队,同时要订立公约,开展竞赛和组织“轻骑队”,反对消

那年夏耕将到,为了写《关于夏耕运动》的文章,我采访了毛主席。那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。对访问毛主席这件事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。那时,他刚结束休养,从福建回到江西瑞金,仍住在叶坪村的一个祠堂里。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争是在春耕大忙时拉开战幕的,在后方

极怠工分子和官僚主义。

临时中央对所谓“右倾主要危险”的毛泽东的不满由来已久。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，中央认为形势“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”，苏区中央局和红军“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”，扩大苏区，攻打中心城市。毛主席认为这是轻视强敌、不顾革命主观力量的冒险主义。宁都会议后，毛主席虽然被迫离开军队，但在广大干部中的威望仍很高，成为临时中央推行“进攻路线”的主要障碍。反“罗明路线”实际的目的是打击支持毛主席的干部，消除他的政治影响。为了推行这条“进攻路线”，临时中央到苏区不到一个半月，政治上有两大“雷厉风行”的举动：一是2月8日下达指示，要求在人口不满1000万的全国苏区和游击区内“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”；二是2月11日至15日五天内撤销了两个省委书记的职务。先在2月11日撤销王首道的湘赣省委书记，“罪名”是对肃反运动“右倾机会主义动摇”，15日又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职务。

罗明的“罪名”是什么？那时，闽西苏区因主力红军第十二军和地方独立师被抽调到江西作战，当粤军陈济棠的部队进犯时，不得不撤离苏区部分地区；罗明又认为在赤白交界的边缘地区，党的政策应该不同于根据地巩固地区。临时中央便指责他是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”，是违反“进攻路线”的“逃跑”主义。于是，作出决议，说福建省委“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”；又由博古亲自出面，在红军学校作声讨“罗明路线”的长篇报告；《斗争》也出版“反罗明路线专号”；责令罗明从上杭赶回瑞金，接受批斗；要福建省委召开临时代表大会，批判罗明的错误。一时间，掀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。

在这场风暴中，我写了两篇文章，都是批判“罗明路线”的：2月19日，为《红色中华》写了“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”的社论，内容是根据15日博古长篇报告思想和逻辑，硬说“罗明路线”的真面目是“不要扩大红军”，“不要扩大地方武装”，“唯一的出路是逃跑”，所以必须用“布尔什维克的火力残酷无情（地）反对机会主义逃跑路线”。28日，《斗争》出版“反罗明路线专号”，内容包括：《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》；博古在红军学校的报告（部分），题为“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”；洛甫的长文“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”，以及我写的“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”等。反对自由主义指的是什么？中央局的决议原来是指责整个福建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，中央局分工主管福建省委工作的任

弼时同志不同意这种打倒一切的做法,决议便在行文上作了此修饰,叫做省委内部“一小部分同志”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,刘晓等“大多数同志”对罗明有“部分的反对与批评”。我的文章就是着重批评那“大多数同志”没有给罗明以“残酷无情”的打击,犯了“腐朽的自由主义”错误。

3月底,反“罗明路线”的斗争进一步升级,开始批评“江西的罗明路线”,对象是邓小平、毛泽覃、谢唯俊、古柏四位同志,撤了他们的职。以后,又反“军队中的罗明路线”,把萧劲光同志抓了起来,判处“五年监禁徒刑”。在江西、福建、湘赣三个苏区内,凡对推行“进攻路线”不积极、不支持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,“残酷斗争,无情打击”到达高峰。

在反“罗明路线”的政治压力下,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践踏。弼时同志却在《什么是进攻路线》一文中,提出要“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”。他说:不应把“进攻路线”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,“在军事上,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,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。”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唯一一篇文章。正因为如此,博古认为他“不合手”,两个月后,把他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我曾见到罗明同志,谈到这件一直使我感到内疚的往事,他对我说:“你那时对我还起了点缓解的作用。”他说:在瑞金检讨时,有一天晚上,中央机关召开批判大会,有几百人参加。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,不断地呼口号。有位年轻干部提出要枪毙罗明,后来,你上台讲话,说还是党内问题,气氛才缓和下来。他在《罗明回忆录》中也写到了这件事。

1933年3月,中央局创办了一所名声很大的学校,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,代替原苏区中央局党校,原党校校长任弼时调湘赣去后,共大由张闻天任校长,我任副校长,董老任教育长。课程有中国革命形势、苏维埃建设、党的建设等。校址先在瑞金的洋溪村,是三栋砖瓦房,四周有围墙。不久又迁到沙洲坝的黄竹堪村,借用一个大祠堂和附近的民房做校舍。说是“大学”,实际上是训练班,学员从最基层的干部到省级干部都有,谭启龙是高级班的学员,也有好多学员是文盲。我在学校里又干行政工作又教书,教员中有人请假时,我就代课,成了“万金油”。罗明同志经过批判后,调到党校任教务处长,兼班主任。长征时,他率领一百多名学员,编入叶剑英任司令员、邓发任政委的中央后勤纵队,参加长征。

军事战略的一场争论

第四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，中央召开了会议。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、张闻天、陈云、周恩来、朱德、毛主席、邓颖超和我。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，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是正确的，肯定了军事上“两个拳头打人”等口号，准备去福建打两个大胜仗。过去毛主席领导作战时，一军团和三军团都是集中起来作战的。有一次，林彪领导一军团单独打了一次胜仗。那是部队在前进中打的遭遇战，歼敌一个旅，但博古等没有全局的设想，为一时的局部胜利所迷惑，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出来了一个“两个拳头打人”的“理论”。为了集中军事大权，这次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瑞金，增加博古、项英为军委委员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前方时，决定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，前方成立一方面军司令部，辖红一军团、三军团、五军团，后来又有八军团、九军团。朱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，周恩来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政委。我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、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。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，宣传部长徐梦秋，秘书长萧向荣。当时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尚未开始，主力红军正在休整。

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原来是周以栗。周病逝后，由王稼祥接任。王稼祥是随任弼时一起到苏区的。他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，到莫斯科的时间比我早一年，后来又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。他思想开阔，到苏区后和毛主席接触多，毛很看重他。我在瑞金时，稼祥同志在前方，后来他因为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，在福建建宁住医院。后来，他回瑞金，我又随朱、周到一方面军去了，部队转战在江西的石城、宁都，福建的建宁、泰宁地区。所以，尽管一个是主任，一个是副主任，两个人其实没有在一起工作。

宁都那次会议后，红军的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。博古根本不懂军事。项英在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，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对他曾有“领导战争能力弱”的评价。后来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了中央苏区，博古在军事上都听他的。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，作风又独断专行，蛮横粗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军事行动上争论迭起：

第一次，是1933年六七月间。中央决定了要红一、红三军团“分离作战”，“两个拳头打



1914年杨尚昆同家人合影。前排右二为杨尚昆；
二排右二为父亲杨宣永；二排左二为母亲邱氏

人”，于是，以三军团为基干，成立“东方军”，入闽作战。在前方的周恩来、朱德认为“绝对不应该”分兵入闽，“酷暑远征”。博古和项英不听，反而来电训斥：“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”，并派我随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。这时，三军团的政委仍是滕代远同志。博古、项英和

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，朝令夕改，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。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，他们也不理睬。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，但我们看得出来。

第二次，是同年11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开始不久。敌人这次“围剿”，规模空前。蒋介石坐镇南昌，调兵100万，飞机200架，以50万兵力用堡垒战术合围中央苏区，逐步推进，企图“竭泽而渔”。恰恰在这时，主张联共抗日反蒋的十九路军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。蒋介石不得不自任“讨逆军”总司令，从“围剿”苏区的部队中抽调十万兵力镇压“叛逆者”。这就打乱了蒋的军事部署，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。彭德怀、滕代远向博古建议：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，集中主力一、三军团和七、九军团，向闽浙赣边区，依托方志敏、邵式平领导的根据地，威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，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，推动抗日运动，破坏蒋介石的“围剿”计划。毛主席也提出：红军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，向苏浙皖地区突进，那里蒋介石兵力空虚，只有保安团和民团，连南京也只有宪兵和警卫部队，别无机动力，我可纵横驰骋于杭、苏、宁、芜和南昌、福州之间无堡垒地带，可解十九路军之围，撤“围剿”中央苏区之敌。当时，我们和福建人民政府已签订《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》。那样做，就可以打乱蒋介石的全盘计划。但是临时中央只有“左”的偏见，没有真知灼见和魄力。博古认为主力离开苏区是冒险主义；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“变种”、“奴仆”，不可靠的“中间势力”，主张不予支持，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；李德既不了解中国国情，又不懂

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,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,却被博古等奉为军事上的“太上皇”。他下车伊始,便错误地宣称“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”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“运动战”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。当红军内部还在争来争去时,蒋介石已使用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,解决了福建事变,又集中力量向中央苏区攻来。我们已丧失战机,全面陷于被动。这时,李德又不顾实际情况,提出“御敌于国门外”,“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”作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中心口号。在争论中,项英专擅地要朱德和周恩来转告彭德怀和滕代远,说军委已作决定,应该“停止建议”。12月,中央决定撤销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的职务,改任他为红军医院的政委。以后,他到共产国际去开会了。滕代远是和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的,是红三军团的老政委,曾获二等红星奖章,两次被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,和彭德怀是老搭档。彭对把滕代远调开很不高兴,但只好服从。

滕代远同志走后,军委派我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。上任前,我回过瑞金一次。当时正是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苏大会前夕,博古等忙于准备这两个会,我就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去汇报。他那时候有病躺在那里,见了一面。以后又去见恩来同志。本来,我是两会的代表,应该参加会议,但这时蒋介石的东路军从闽中西进,协同北路军向中央苏区袭来,军委命令三军团从建宁东出延平、沙县,阻止蒋军西进。我立即赶回三军团,没有参加两会。临走时,恩来同志还要我把炮兵营带到三军团去。这个炮兵营其实只有两门炮,100多发炮弹,但在那时已经了不得啦!两门炮是打漳州时缴获的,长征时还抬着,到过草地时才砸烂了扔到河里,那是后话了。

1934年1月,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,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发展到最高峰。会议强调中国已面临直接革命形势,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。通过两会,中央在人事方面的安排:一是博古、洛甫、项英、周恩来为政治局常委(即书记处书记),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任弼时等被排除在外。二是毛泽东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,由张闻天接替。这样毛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架空了。闻天同志对此并不高兴,对博古颇有微词。三是朱总司令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,但另设了由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组成的军事“三人团”,实际上的决策人是后来被称为“洋钦差”的李德;周恩来、王稼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,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。